

### 方去疾刻「蛇」生肖印



方 箴

“龙驾祥云门敛福，蛇衔瑞草户迎春”。甲辰乙巳之交，兹选父亲方去疾篆刻“蛇”生肖印与大家共迎乙巳新春，并祝大家蛇年吉祥，诸事顺遂。

父亲刻“蛇”生肖印仅见一方，朱文，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印面以朱文线条刻画，蛇呈盘行状，体态柔软轻盈，蛇首抬起回望，口微张，蛇信长吐，微翘弯曲，动态逼真，蛇身以一根粗朱文线条单刀循序推进，粗细变化自然生动，至蛇尾处卷曲翻转，似断非断，线条灵动，用刀从容流畅，将蛇首、蛇身、蛇尾在盘行中的动态表现得活灵活现。并极富艺术夸张地添刻了蛇足。

全印布局随蛇行而动，单刀刻画简练而富生机，边框也随蛇的盘曲姿态呈半圆弧形刻就，整个印面生动呈现出“蛇吐瑞气贺新春”之气象。

来北师大访学，住在京西北角的昌平校区。偏是偏了点，但也有它的好处，赶集方便。

小寨集市不大，三面低矮的白色围墙圈着，没墙的那面，是十几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早晨七点多，也顾不上冷，商户们陆续续续来了。不大的市面，却也一应俱全。蔬菜、水果、干果、盆花……各种日用品一一卸下来摆好。

春节是个大口袋，家家户户都想把它填满。十点多，很有些人头攒动的意思了。再晚些时候，赶集的人饿了，小吃摊热闹起来。

荆州公安锅盔、重庆小面、老葛濮阳馍、徐州肉酱米线、正宗单县老杜家祖传羊汤、老北京老汤卤面、小炖肉打卤面、豆角焖面、安徽板面、长沙臭豆腐、老张吊炉烧饼、西安肉夹馍、淮南牛肉汤、福建千里香大馄饨……摊子挨着摊子，热气腾腾。赶集的都是附近的人，知道哪家对自己的口味。

买了几个洛川大苹果，一袋刺成小段的广西甘蔗，又东看看西望望逛了会儿，差不多十二点，我在一家头顶的横幅上写着“正宗东北锅包肉”的小吃摊前停下来。它让我瞬间想起去年冬至我去北极村，在“老猎户”家吃的锅包肉。外面零下二十六七度，白雪耀眼；屋内暖气充沛，香气氤氲。

几张桌子排成L形，上面搁着两只油锅、算子、箬篱、盛佐料的盆盆罐罐等物件。算子架在一只绿色的塑料盆上，上面摊着炸过头遍裹着面糊的肉片，每片茶杯口大，白的。摊主是位黑红脸膛的中年男人。我问怎么卖。他说，大份26元，中份21元，小份16元。来个中份吧！我说。好！男人爽快地应着，边一手拿起夹子，一手拿起一只新的方便面桶大小的纸盒。他从算子上拣了十来块肉片到纸盒里，转身在左手边的小电子秤上称了称，然后，打开炉灶和鼓风机。鼓风机像一阵小而猛烈的飓风，吹得火苗哧哧作响。待油温上来，鼓风机

### 赶一寨集

一关，肉片倒进去，锅里一下开满了花。等待的工夫，我和师傅聊天。他是黑龙江大庆人，来昌平两年了，租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租金一千块钱裹不大住。每周二四六赶小寨集，三五日赶沙河大集，周一进货，面啦，白糖啦。一年下来能落个十几万块钱。我说就是冬天怪受罪的，露天，又没个棚子。他说北京就是风多，没风还行，不过冻手冻脚也惯了。师傅说话不耽误照应锅，不时拨弄一下。大约四五分钟，炸好了，关火，箬篱捞出来控着，同时打开另一只炉灶和鼓风机，锅底泼上油，撒上葱、姜、蒜、辣椒、白糖，倒点醋进入，香味爆出后，箬篱一倾，肉片进锅，翻几个滚，炉子和鼓风机一关，盛在一开始的纸盒里，满满尖尖一桶，插上两根牙签，双手递给我。

我接过，迫不及待挑起一块咬了口，嗯！嗯！好吃！好吃！我忍不住夸赞。这时，有人走过来问我怎么样，我指指迎风飘扬的幌子，“就那写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一点不错，你也尝尝！”

做这个有技巧的吧？我边吃边问。那是！关键在腌还是在炸？在炸。

他听我说话问我是不是山东人，我说是。问他，高密的，山东老乡。再多聊几句，他1992年财经大学毕业就在北京工作了。他脚边的小手拉车上，装满了各种蔬菜水果。

风停了，冬日的阳光照耀着，让人觉得全身暖烘烘的。

### 沾溉萌芽百花开

张广智

提壶浇花七十载，沾溉萌芽百花开。历经风雨时飘落，繁花似锦永不败。

丙申初冬，一个暖和的下午，我走进了巨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协大厅，作为该年上海作家协会发展的新会员之一，来这里出席“2016年上海作协新会员座谈会”。会议主持人要求新会员挨个发言，每个人都激情满怀而又迭现个性。轮到我了，我有备而来，赶紧从包里拿出一本旧杂志示众，指着那嫩黄色的封面，一个小孩正在提壶浇水，我深情地说道：“我的文学梦始于这本杂志。”忆往事，多年来的魂牵梦萦，这幅



像一直烙在我心里，不时引发我无限的遐想。想起了那提壶浇花的画像，立即化出昔时的情景：1956年，是时新生的共和国的前进步伐，像飞速转动的车轮一样，带动了各行各业，“毛泽东时代”的光芒，也推动了新文化的复兴，于是由上海作家协会创办的一份新刊《萌芽》应运于党的生日7月1日而生，巨鹿路675号就是她的诞生地。

回望历史，距今95年前，鲁迅在1930年1月主编创办了《萌芽》，旨在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以推进左翼文学运动。69年前，巴金在新的《萌芽》创刊号撰文祝贺：“任何美丽的花朵，任何参天的大树都是萌芽长成的。”画家黄永玉为创刊号创作了封面画《我们的幼芽》，于是小孩提壶浇花，形神兼备，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形象，饱含生命之绚烂，熔铸心灵之玉润，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不可泯灭的“心灵图画”。

是的，参天的大树都是从萌芽长成的，在当时都是“幼芽”，比如陆文夫，他的《小巷深处》(1956年第10期)，编辑部的推荐词说：“陆文夫同志用优美的笔触，给读者描绘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形象。”这篇在《萌芽》发表的短篇小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后来竟成了大作家陆文夫的名篇。

又如编辑部厚爱徐州贾汪煤矿青年矿工孙友田的诗，后又经诗人芦芒的开导，孙友田迅速由“幼芽”而成“长”。回想起来，他在《萌芽》刊发的处女作《地下的炮声》，“我们把地下的火山战胜，从岩石的咀里，掏出了幸福、光明！”那摄人心魄、激动心灵的诗句，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在新时期，当年的“幼芽”孙友田，已是江苏省作家协会诗人群的

中坚力量。想起了提壶浇花的景象，让我对《萌芽》充满了感激之情，不由使我回忆起年少时的文学梦。此时，这个梦主要受到了任课的语文老师的影响，从小学时萌生至初中时渐进，直至高中时深入，但其助推力却来自初高中过渡时创刊的《萌芽》，它浇灌滋润了万千文学新人，也哺育了我，使我从少时就立下了想当文学家的鸿鹄之志。

这个少年时代的文学

穿新衣在我小时候大体上是一年一遇的事。这“一遇”是在每年的春节——小孩可以有保障地指望得到新衣，也就是这个时候。大年初一穿新衣是过年习俗的一部分，和拜年一样，“破旧立新”的年代也没破掉。日子再怎么窘迫，总得让小孩有新衣上身，最好是全新，无力做到“崭新”，也要变着法子出新，多半是将大人不是太旧的衣服改一下，以旧翻新，就“这一件”而言，也算是沾了“新”的边了。

过年在冬天，这时候的南京还很冷，得穿棉袄棉裤，新衣因此必是冬衣。棉袄棉裤通常只有一套，一个冬天从头穿到尾，弄脏殆不可免，却又不能洗——不仅是棉衣没有闲下的工夫，而且洗来费事，全称应叫作拆洗，因里面絮的棉花不能经水，须像洗被子一样先拆了再洗面子，洗一回就等于重做——故例须有罩衫罩裤来加持。也不独小孩如此，棉袄棉裤外加罩衫罩裤那时似乎是固定搭配，已成“体制”，证据是军队、警察冬衣发下来，都是袄与衫俱。大多数人衣过年时做不到让孩子“里外三新”，所谓“形象”之所重，又是形之于外者，自然都在罩衣上发力。即使是外面一层，从头新到脚也是力所不及的，而与下半身相比，上半身更是观瞻所系，故我印象中普遍的选择，是首先力保罩衫。

幼儿园阶段，比较常见的是是一大围兜，袖口有松紧，开口处系绳或揷钮在背后，非得大人帮着

待不必说，男孩也不无期待。我对过年穿新衣颇有意见，是别有原因的，起先是因为对罩兜的反感，穿上身感觉像是被捆起来，而且一看就是个小孩子。上小学后则又觉大年初一约好了似的，不迟不早一早穿新衣，有点冒傻气。

但是我不反对女孩同时穿新衣：男女有别，男的只是穿衣，穿新衣最好也不要那么显，女的穿衣同时就是打扮，不妨隆重或仪式化。到寒假结束，不少女生身上还是过节的新衣，花红柳绿的，人着新衣精神爽，叽叽喳喳的，就比平日多几分莺歌燕舞的意思。男生的新衣从色彩到样式都很单一，无甚可看，女生虽因有棉袄罩衫的限定，似乎多是细洋布做成近乎中装的样子，却可以有图案、色彩的较大变化，或格、或纹、或花，红黄蓝绿，无所不可，总之是“花褂子”。

新衣难得，大人授衣之时，自有许多嘱咐，要之不可盯着穿，穿时要小心，有些地方不能去。然而拢共就几件行头，再怎么小心翼翼，新衣还是不可避免地往“旧”里走，旧了，也就离破不远了。“旧”的同时，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变小，因为人在长大。若有弟弟妹妹，一个一个，可以递送下去，当然也可自加变通继续穿。比如棉袄罩衫小了当作春秋衫穿，再往后还可以当作内穿的衬衣，“花褂子”通常用的花布都较薄，而旧到那地步，柔软到穿在里面也无不适了。

这些我原是不知道的，是中学时有个跟我关系不错家境很好的同学将他发现的一个秘密告诉我，说坐他前排的漂亮女生一件衣服哪个季节都能穿。说时口气里有几分鄙夷，表情却有几分怜惜，我回想一下，再看看那女生毛线衣里露出的领子，图案确乎与她过去穿的棉袄罩衣一样。那同学后来又还对别人说起过，却受到一通嘲笑：怎么会留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对人家有意思吧？

### 过新年，穿新衣

余斌

想说的一点是对文史贯通的感悟，在悠长的治史路径中，《萌芽》的雨丝风片，不时在我心中激起涟漪，徜徉在文史之间……

闪回。我指着《萌芽》创刊号的封面，继续说道：“请大家留意，封面这幅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创作的《我们的幼芽》，多的来，那孩子提壶浇花的意象，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早已幻化为一幅挥之不去的‘心灵图画’，足足陪伴了我一个甲子。”会场即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被我矢志不渝、不忘初心的文学梦感动。五年后，2021年我又顺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于是文史合一，我不只是一位史学研究的学者，而且还圆了文学梦，成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名“新兵”。

会后，沿巨鹿路东行，我不时回望675号，这数字如今已建成一座“圣殿”的代码，从最初的《萌芽》一路走来，“历经风雨时飘落，繁花似锦永不败”，激励我们去点燃繁花的愿景之火！



梦，却被1959年的高考拦断了，我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年秋，从求学、工作直至退休，我与复旦结下了66年难以割舍的情缘。在大学时代，主要关注的期刊是《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等，偶尔也跨界翻阅《萌芽》《文艺月报》等。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忘《萌芽》对我的滋养，最



蛇年大吉 (书法) 丁申阳

南溆三道茶，是我们湖州人的待客之礼，新年这样隆重的节日自不例外，有客人登门，尤其是贵客，那么一甜二咸三清香，是一道也不能少的。

第一道“甜茶”，俗称“锅糍茶”，是用糯米饭涂在铁锅表面烘烤成白色的薄片锅巴“锅糍”，加糖冲入开水，泡软了，甜香带着米香，无须咀嚼，丝滑入口。

第二道“咸茶”，叫作“熏豆茶”，是以秋天的青毛豆加盐煮熟焙干成熏豆，配以丁香萝卜(胡萝卜)干、橘子里皮、白芝麻、卜子(紫苏籽)等小料，冲泡成一碗五彩缤纷的“茶”汤，所以熏豆茶除了喝，还要把这些丰富的“茶里果”吃进肚子。这第三道“清茶”，才是真正的湖州本地绿茶。吃过

甜的咸的，已有些饱腹感，就来一杯安吉白片或顾渚紫笋泡的绿茶闻闻香，润润口，边捧茶杯焰手边坐下来谈天说地，在这种“落胃”的感觉中完成亲朋聚会、其乐融融的仪式感。湖州人说，锅糍茶好比生活的甜蜜，熏豆茶象征生活百态，而最后的绿茶，则是生活终将回归的平淡。在湖州人的眼里，“三道茶”喝的不仅是饮品，更是人生的进行时。

“南溆三道茶”在2016年被列入了浙江省非遗名录。不过对于我这样的湖州土著来说，“三道茶”纵使拥有响亮的非遗名号，但终究只是生活中的寻常

### “民以食为天”的待客之礼

戴望云

之物。糯米锅糍可以成为普通的早饭、夜点，或者成为病人、舍姆娘(坐月子的妇女)的滋补食品。而熏豆是孩子们喜爱的零食，做好的熏豆一般装进白色纱布袋，那是我小时候的魔法袋子，掏两把豆子装进随身衣兜，就可以嚼上半天。但在特殊场合，这些日日之食之食会被赋予不同寻常的意义：当年长我很多的表姐第一次带对象来家过年时，家里长辈说，“毛脚女婿”上门是一定要喝三道茶的，喝了这茶，才算是进了咱家的门。年幼的

我不解地问：“为啥叫‘毛脚女婿’，是因为表姐夫像我爸那样长了很多腿毛吗？”

进入民俗遗产化的时代，乡土民俗也讲起了新故事，“三道茶”中的“熏豆茶”变成了“防风神茶”。防风氏是大禹同时代的神话人物，湖州德清下渚湖畔防风氏祠前的《防风神茶记》碑文中说：“吾乡为禹命治水，劳苦莫名。里人以橙子皮、野芝麻沏茶为其祛湿气并进烘青豆作茶点。防风偶将豆倾入茶汤并食之，尔后神力大增，治水功成。如此吃茶法，累代相沿，蔚成乡风。”故事情

节很神奇，但细细读来，却可以看到茶中之豆是以粮食的面貌出现的，这很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有着五千年栽培史的大豆，正是中国人重要的粮食作物。所以今天的熏豆以及锅糍所冲的茶，与其说“喝”，不如说“吃”——“不如吃茶去”。这些以“茶”为名的“茶点”告诉我们，吃饱肚子的富足感，是湖州人给贵客最诚挚的礼遇。不管“民俗”如何变成“非遗”，它讲述的，永远还是那个“民以食为天”的真挚心愿和朴素道理。

### 十日谈

非遗里的中国年 责编:吴南瑶

流传已逾百年的“五虾闹鮑”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